

# 范仲淹的教育活动与宋型文学的生成

陈彦昭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范仲淹的政治活动总是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为了获得治国安邦的人才、解决北宋的经济军事社会危机,他兴办学校、教导生徒、选任学官、言传身教、撰写教育文章,以丰富多样的实践形式传播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了大批关心百事、积极参政、砥砺气节、个性张扬的新型士人。这些具有新型思维方式、新型行为方式和新型文道观的士人将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和治国安邦热情注入文学创作之中,以社会百事为题材,以议论思辨为着力点,以新警奇峭的表达方式阐述精深多讽的思想内容,创造出了迥异于唐代的文学范式,以思理筋骨见长的宋型文学也自此开始逐渐生成和发展。

**关键词:**范仲淹;教育;宋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13)01-0092-02

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武全才之一,是北宋时期的一代名臣。而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的政治实践往往都与文化教育密切相关。在“学校,王政之本”的思想指导下,不管在朝堂还是地方,在中原还是边疆,他都不遗余力地兴办学校、培育人才。正是在他的领导与推动下,北宋终于一扫宋初三朝文教凋敝的萧索局面,“海隅微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出现“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的教育盛况,他教导和提拔的一批人,如名臣富弼、名将狄青、理学家张载、太学先生胡瑗和孙复、经学家许元,也都成为北宋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一些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更重要的是,范仲淹的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北宋士大夫精神气格的定型,开启了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作为这种新型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字表现,宋型文学也逐渐得以生成。本文正是从范仲淹的教育活动入手,分析其教育实践与教育理念对北宋士人思想品格、精神面貌的改变,以及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文学创变。

## 1 范仲淹教育目的与新型士风的生成

范仲淹发展教育的目的是为治国安邦培养人才,他指出,“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张良、陈平之徒,秦失之而亡,汉得之而兴;房、杜、魏、褚之徒,隋失之而亡,唐得之而兴”。因此在教育实践中他不仅重视以经世致用之学为教学内容,还以身作则,以自己救民疾、分国忧的社会担当感染生徒,倡导士大夫要以天下为己任、将济世热情与道德人格完美地结合起来,震荡了一代士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就作于范仲淹执政邓州、执教春风书院期间。于是,宋代学生纷纷“以范公之学为学,穷不措其志,达不变其操”,终而一改宋初重文轻武政策所导致的姑息为安、知足保和的士人风貌,一时间,“士品淳而文风振”,从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文章中都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士大夫空前高涨的政治热情、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自此开始,终宋一朝士大夫都有着极为昂扬的议政精神,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后来的屡次党争,士人的“言事之

风”作为一种政治习气,“一直伴随宋代三百年”。

## 2 范仲淹教学内容与新型文道观的生成

范仲淹重视经学,他强调“劝学之要,莫尚宗经”,主张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要“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但他并不推崇传统以注疏解释为主的汉唐经学,而更强调经世致用,他跟仁宗指出:“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教?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也就是说,“经”具有其他文献难以企及的丰富文化内涵,学生可以通过学习经典获得较高的道德水平和从政能力,但若拘泥于反复记诵那些帮助扫清阅读障碍的“章句之学”,便是舍本逐末了。除此之外,他十分推崇医科、武科等实用科目的教学,鼓励学生以自己擅长的方式服务社会,进而为公卿者可,退而为乡先生者也可,文能传道移风俗者可,武能上马定江山者也可,不必都以进入仕途官至公卿为唯一成材标准。这就渐渐地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各行各业百事皆高的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不仅为士人蓄势待发的参政热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操作途径,还为重新定位中唐古文运动以来逐渐被神化的道统思想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北宋诗文革新指明了方向。

北宋初年,古文家们延续了唐代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核心价值观,石介等人以“道统论”批判西昆体、推崇古文创作,狂热地认为文的唯一价值就在于施行教化、传承道统,而道统传承则被他们扭曲为一种对社会现实进行危言耸听的描述同时鼓吹、神化“圣贤”的极端活动。在如此偏激的文学思潮背景下,文坛领袖欧阳修继承了范仲淹重视百事的观念,提倡文道并重,改良了宋初柳开、石介及其追随者好古为戾,以怪诞的言论和疏狂的行为神化“道统”的狂热主张,将“道”分为圣人之道和诞人之道,指出圣人之道“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存于日常百事之中,就是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之理,好文章就应该以易知易明之文表达日常百事之道。在欧阳修的理论阐释和创作示范下,宋初一直存在的文道之争基本解决,宋文平易流畅的基本特征也基本确定。而如果没有范仲淹务实的教学理念在前,欧阳修主导的诗文革新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遭受到更大的思想障碍。

## 3 教学方法与新型思维方式的生成

上文提到,范仲淹非常重视经学的现实应用,并为此把教学方法新颖的孙复、胡瑗引入了太学。

孙复在太学中主讲《春秋》,据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记载:“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可见,孙复的教学方法是“不惑传注”、“考时之盛衰”,走出传统春秋三传注疏的解释框架,以今解古。

胡瑗的“苏湖教学法”也是类似,他主张教学要“明体达用”,“体”为经书所承载的人格道德,“用”则是现世所需的为政之学。如讲解《周易》“小畜”时,他先做了“畜,止也,以刚止君者也已”的常规训诂之后,就举了宋初宰相赵普不顾太祖盛怒、直谏君主之事加以

作者简介:陈彦昭(1990-),女,四川宜宾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文学

阐述,使得经术课程由原来的章句之学一跃而变成了致用之学。<sup>⑩</sup>

这种教学方法和治学态度改变带来的是太学生思维方式的改变,他们不再迷信经典与权威,开始自由地探索一种更接近现实生活、更贴近个人经验的阐释方式。庆历以后,对经典文献的新阐释层出不穷,汉代以来“守训故而不凿”的经术传统被打破,“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词》,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sup>⑪</sup>。

事实上,这种阐释方式的转变不仅针对传统文献,更是针对社会人生。面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问题,从章句束缚中挣脱出来,饱含一腔救国激情的士人们不仅要寻找新的学术秩序,还要寻找新的社会秩序,于是各种个性鲜明的政治观念与思想立场也应运而生,开启了北宋波涛汹涌的革新与党争,也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北宋士人善于思辨的文化性格和百花齐放的文化生态。

#### 4 范仲淹的教育活动与宋型文学的创作

文学是思想的皮肤,它以最形象的方式展现出思想骨肉生长的肌理,也以最明确的方式限定了思想血脉喷薄的处延。范仲淹顺应当时需要,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关注现实、敢于创变的新型士大夫,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北宋士人精神气格的改变。而随着士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作为思想文字外衣的宋代文学也开始转型,终于从宋初三体的唐代遗风中突破出来,以筋骨思理见长的独特文学品格开始萌芽。这一点在范仲淹本人的文学创作中即可看出,其诗词文赋,无一不体现着他的慷慨气格。而范仲淹舞文弄墨流连风骚的时间终究不多,宋调的新创主要还是由他所教育、提拔和影响的学官文士来实现的。

宋诗方面,诗人们在关心百事、积极参政、砥砺气节、发扬个性的教育下,纷纷在题材上增加现实内容,在表达方式上“议论争煌煌”,在诗歌精神上追求昂扬的气格,推崇不拘一格的诗风,创作出一批雄豪奇峭、古拙怪巧、迥异于宋初三体的杰出诗作。由范仲淹推荐为官的苏舜钦诗风豪迈,他将深刻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政治参政热情融入诗歌,创作出了《庆州败》、《吾闻》、《吴越大旱》这样气象阔大的作品。深受范仲淹欣赏的梅尧臣则以细密的观察和精密的描写将各种难状之物、难摹之景写得栩栩如生,奠定了宋诗题材丰富、意境新奇、语言精工的基本特点,“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小村》)这样余味悠长的诗句也充分体现诗人的现实情怀。稍后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司马光等人则以“明妃曲”为话题反复唱和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把诗歌作为议论政事、交流思想之载体的功能发展到了极致,也开启了宋诗注重“思理”的创作传统。

宋词方面,范仲淹以一首慷慨悲凉的《渔家傲》在婉约华丽的早期宋词中独树一帜,实则已经为后来苏轼对宋词的新变埋下了伏笔。

宋文方面,孙复、胡瑗的教学方法启发了学生求新求变的思想意识,他们勇于并且乐于推翻旧说,用自己独到的见解来阐释经典、解读社会,因此,与之相适应,他们也倾向于选择信息承载量大、表达力更强的古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故而欧阳修说“臣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sup>⑫</sup>,可见以范仲淹为主导者的教育活动对宋代文体革新的重大意义。

#### 注释:

⑩ 欧阳修:《吉州学记》,见《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九,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1页

同上,第12页

⑪ 范仲淹:《选任贤能论》,见《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页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附录》二《年谱》,第904页

⑫ 转引自文娟:《范仲淹教育思想研究》,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5页

谢琰:《欧阳修排抑“太学体”发覆》,《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0期,第93页

范仲淹:《上时相议制举书》,见《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范仲淹:《上执政书》,见《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九,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见《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页

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4页

⑬ 王得臣:《忠说》,转引自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⑭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转引自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⑮ 欧阳修:《条约举人怀挟文字子劄子》,《奏议集》卷一五

#### 参考文献:

[1]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校).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2]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

[3] 苗春德.宋代教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4] 孟宪承(选编),孙培青(注释).中国古代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 袁征.宋代教育——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性转折[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